

杰出的外交战士——潘自力

洪 开



潘自力
(1904~1972)

1954 年 11 月调入外交部。

1955 年 1 月至 1956 年 2 月任
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1956 年 4 月至 1962 年 7 月任
驻印度共和国大使并兼任驻尼泊尔王
国大使（至 1960 年 8 月止）。

1962 年 12 月至 1966 年 5 月任
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

我在照片上看到一位身材高大、体魄魁梧、皮肤白皙、有着深度近视，容貌端庄、慈祥，态度平易、谦和的老同志，他已离开我们 20 余年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党的政治工作者和杰出的外交战士潘自力同志。

潘自力同志生于 1904 年，陕西省华县人，1923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 年 9 月，他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岗位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我驻朝鲜、印度、尼

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他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1955年1月，潘自力同志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

出使前，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向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在朝工作“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

潘自力大使遵循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朝鲜停战后，正当朝鲜政府领导朝鲜人民紧张地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刻，踏上了前往朝鲜的路程。

中国驻朝鲜使馆的参赞李石专程到丹东去迎接潘自力大使及夫人姚淑贤。原来李石同志也是十九兵团的干部，他们见了面感到格外亲切。在李石同志的陪同下，潘自力一行顺利地到达了平壤。

对于中国驻朝鲜新大使的到来，朝鲜政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外务省礼仪局局长到边境迎接，并在火车上举行了便宴。潘自力大使到使馆不久，便向金斗奉委员长递交了国书。呈递国书后，朝鲜外相设宴欢迎，也邀请了中国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夫妇出席。朝鲜同志很讲究礼仪，外相在席间拿出讲话稿，站起来宣读了他对中国大使的欢迎词。

在朝鲜外相举行的宴请之前，潘大使曾问过使馆其他领导同志，是否需要准备讲话稿？作为一位新从地方到外交岗位工作的同志，对朝方的宴请有这样的考虑，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根据首席馆员的介绍，馆里没有准备文字讲稿，所以当朝鲜外相在席间庄重地照文稿宣读欢迎词时，中方在座的同志因为事先未给潘自力大使准备致答词文稿，相当尴尬、不安。但潘大使在这种情况下，显得非常沉稳，胸有成竹，因为他事前曾和担任译员的秘书做过准备，有了腹稿，临场则按原来斟酌过的内容致了答谢辞，而且其内容和措词很周到得体。这是潘自力出使朝鲜进行两国间礼仪交往的第一件大事，表现出他在紧要关头，头脑冷静、仪态大方，随机应变，缜密办事的能力。

潘自力大使入朝后，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朝鲜政府、劳动党有关官员礼仪上的拜访和公务上的交涉，与在平壤的使团建立了正常的关系。随后他又看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他对使馆同志说，全国人民支持志愿军完成了神圣的抗美援朝任务，他们为祖国、为朝鲜立了大功，为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贡献，志愿军是用鲜血和生命完成任务的，他们将武装上比自己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军队打败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潘自力到志愿军总部受到李志民政委和杨勇副司令员的热情接待。潘自力和李志民原在晋察冀边区和十九兵团一起工作过，是在解放大西北后分手的，老战友见面，又是在异国他乡，自然格外高兴。

潘自力大使到朝鲜后，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在与朝鲜同志的工作接触中，坚持原则，谦虚谨慎，平等相待，商量办事。凡是朝鲜党和政府邀请使馆参加的重要活动，他都亲自出席并提前到场。朝鲜到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回朝后，他都要请到使馆，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征求意见。有一次秘书拿着中华牌香烟说：“‘大中华’来了。”他立即指出：“中华烟就是中华烟，哪来一个‘大’字。”他运用各种方式教育使馆工作人员清除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还经常教育使馆人员要严格遵守驻在国的法令和各种规定，外出时要带外交人员工作证。

潘大使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对使馆起草的任何文件、电报稿，都非常仔细地审查，对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有一次李石同志在文稿中将银行的“银”字，写成了“艰”字，被他指出，李石检讨了自己太马虎。他对潘大使的严格认真态度十分敬佩。潘大使认为使馆的文稿，如果有错漏字，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绝不能疏忽。

潘自力大使重视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强调必须根据工作需要学习多种外语，特别是朝文。使馆专门请了一位从中国回国的朝鲜女教授教朝文，他自己和使馆同志们一样参加学习，他的夫人也跟着学。由于学习认真，使馆的一些同志能够直接阅读朝文报刊，对使馆的工作很有好处。潘大使除学朝文，还复习俄文，从不放过一切机会学习。一次他应苏联驻朝鲜大使的请求，陪苏联大使及参赞访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每当途中停车休息时，他就向苏联同

志学习俄语，重温单词。他的学习精神受到苏联大使的赞佩，并对他的参赞说：“像中国大使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我相信他的俄文会很快成功的。”

潘大使在朝任职时间虽不到两年，但他以诚恳、谦虚、谨慎而又积极的态度，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朝鲜人民和干部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增进睦邻友好

潘自力同志于 1956 年 2 月调离朝鲜后，于 1956 年 3 月出任我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在任期间，两次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尼泊尔，两次陪同尼泊尔首相访华。

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也越来越频繁。1956 年底到 1957 年初，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 8 国。

1956 年底潘自力大使陪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了印度。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受到了隆重、热烈、盛大的欢迎。

11 月 29 日上午，在印度总理尼赫鲁陪同下，周总理观看了印度根据国民纪律培养计划组织起来的 3000 名德里少年儿童的体育表演。中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印度总统普拉

沙德。在总统府出席了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午宴。下午访问了印度国会并发表演说。晚上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国宴。11月30日晚上周总理等出席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举行的招待会。到会的500名客人中有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12月5日晚上，周总理在马德拉斯市市民欢迎会上向2万群众发表演说，强调：我们共同倡导了五项原则，并且在一同宣传这些原则方面作了有成效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友好合作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总理所到达的每一块印度土地上，德里的欢迎群众难以数计、孟买和加尔各答百万群众欢迎并举行集会，“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遍印度城市和乡村。两国总理进行了友好会谈，周总理举行了两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间的友谊有2000年的历史，流传下来许多可歌可颂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只有一种共同愿望，那就是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努力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两国倡导了五项原则。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赞成了这些原则，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尼赫鲁说：“当这样的两个国家手拉着手前进，当他们被友谊联结起来时，这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

作为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潘自力，为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成功访问印度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访问的顺利进行。

1956年8月19日至9月20日，以潘自力大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夏尔马外交大臣为团长的尼泊尔代表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中尼两国关系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贸易和往来朝圣等问题，在加德满都进行了友好谈判。

9月20日，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宣布两国应保持和平友谊，立即废除在此以前存在于两国之间包括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条约和文件等。

潘自力和夏尔马还就关于两国关系中的若干有关事项、关于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签署了两个换文。中尼两国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在新协定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9月23日和2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毛泽东主席相互致电祝贺。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访华的宴会上讲话说：这个协定是中尼友谊的新的里程碑。这个协定说明，在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已经建立起友好和亲密的睦邻关系。

潘自力根据中央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当年任我驻印度使馆参赞

的符浩同志回忆说，当潘大使“完成任务回到德里时，曾同我谈到谈判的经过和经验，他那认真、谨慎和善于工作，以及完成任务后的谦虚态度，使我每一想起，都觉得是又得到一次教益。”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6国。潘自力再次陪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印度、尼泊尔。

当时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刚刚过去，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都企图乘机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周总理通过这次访问，充分表达了中国愿意同自己的邻国睦邻友好的真诚愿望。他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印边界问题，比之维护两国友好合作的根本问题，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最大努力。

中国政府为充分表达与邻国和睦友好相处的愿望，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总理举行7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同陈毅副总理4月26日结束了对印度历时7天的访问。在潘自力大使的陪同下，于26日上午乘机抵达加德满都。柯伊拉腊首相和几乎所有的尼泊尔国家领导人到机场欢迎。尼泊尔首都放假一天，市民聚集在街道上热情欢迎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访问尼泊尔期间，双方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

潘自力大使在印度、尼泊尔任职期间，根据中央指示

精神，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正确判断形势，灵活地运用策略，工作中卓有成绩。

三、坚持原则，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1962 年 11 月潘自力同志调任我驻苏联大使。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多事之秋，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任务和职责。中央对驻印度使馆和驻苏联使馆的工作特别重视。派驻这两个国家的大使，在我党内的地位都比较高，潘大使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工作中对执行中央的每一个指示，都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和情况，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精神。中苏之间的问题，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不完全是中苏关系问题。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很多扩张主义的政策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或是我们反对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必须了解清楚，要斗争就必须有充分准备。潘自力大使对涉外斗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中央的指示、文字都很简洁，必须反复推敲领会外交斗争是兵对兵，将对将，这同打仗指挥部在后面，有一帮人帮助司令部出主意指挥不一样。比如潘自力大使同赫鲁晓夫谈判，同苏共对外联络部长谈判，翻译、记录是不能插嘴的，别人帮不上大使的忙。大使的责任重大，他代表本国政府、首脑。两国关系如果友好那好办，但那时的驻苏大使工作就难办。在会谈或交涉中，凡事都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针锋相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

卑不亢，同时又注意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表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风格。他不仅立场坚定，斗争勇敢机智，而且又是熟悉业务的外交战士。他认真学习钻研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逐字逐句地领会中央的指示，准确地把握中央每个指示的精神实质，在斗争中正确地加以运用。他对工作极其严肃谨慎，重大问题、重要事件，总是先向中央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从不擅作主张；对于复杂的国际斗争，他总是冷静地进行分析，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势，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

潘自力同志是一位有学问的大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政策知识，不仅熟悉我国的外交政策，也熟悉别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历史、法律和现实情况。他的记忆力强，很多东西第二天要用，他头一天就记在脑子里。潘自力具有外交家应有的优秀品质，他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党的事业。他处事冷静而不感情用事，他观察问题高瞻远瞩，而不为表面和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他掌握政策全面稳妥，洒脱大方，不卑不亢，能十分得体地处理各种关系，在莫斯科外交使团是一位颇有声誉的大使。在使馆内部也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老首长。他有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在每次进行外交交涉之前，也还把使馆的有关同志找去商量，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估计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准备几个方案，一点也不马虎。当使馆内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他既提出自己的看法，又把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也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决策。

在苏共开二十三大时，潘大使生了重病。二十三大是苏共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他对自己作为大使，因病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不能具体参与调研工作，深感内疚，躺在床上难过得直流泪，使馆的同志对他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无不为之感动。

四、一尘不染，廉洁奉公

潘自力大使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年仅 24 岁就担任了省委书记，但从不摆老资格。他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不沾公家便宜，清正廉洁，生活艰苦朴素，从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一贯公私分明。对子女和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大儿子潘亚黎上中学时，他对孩子的生活费用控制很紧，不准乱花钱，每月底要和孩子算一次帐。他常常叮咛身边的人，不要随便领公家的东西。他教育子女说：“自小不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长大了就成了少爷公子。”他女儿女婿在延安工作时，多次要求调回西安省城工作，他总是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在老根据地工作，不要嫌苦怕累。

潘自力对待同志，却平易近人，平等相待，能广泛密切地联系群众。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党的小组生活会都能按时参加，他在陕西任省委书记时，和秘书、警卫员等工作人员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带头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组织生活很活跃，相互之间也能认真坦率地进行批评帮助。

出国前，一次支部召开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问题，他到会时，同志们让他坐沙发，他坚持不坐，要和大家一样坐在硬木凳上，不摆领导架子。潘大使在驻朝使馆工作时，生活也很简朴，对自己要求严格，和大家一起用餐，统一标准。他唯一喜欢的是面食，尤其是西北的羊肉泡馍和菜面条。那时，使馆人员每天都出早操，他大都是第一个到操场，无论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或是头天晚上工作忙碌到深夜，他照样和大家一起出操，从不间断。他和使馆人员一起参加劳动，打扫卫生。每逢过年过节，他都要约集在使馆内工作的朝鲜服务人员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对他们的生活也特别关心。对于使馆的炊事员、公务员、司机等同志，他经常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对干部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在思想上、工作上严格要求，有了缺点及时指出、帮助。

使馆财政开支有制度，但也有灵活的一面，特别是涉外大使就更灵活了。潘大使从不沾国家一分一厘。1965年夏天，他到外地去旅行，同行4人，途中吃西瓜，他自己出钱，其实大使在外吃饭可以报销，水果也是可以报销的，但他却坚持自己付钱。在一些公私难分的情况下，他宁肯自己出钱。同志们称赞他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潘大使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模范，他与妻子相亲相爱、互尊互敬。妻子姚淑贤称丈夫是良师益友。敬佩他的高尚品格，说他“心底无私天地宽，胸怀坦荡能行船”。说他为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对己严，待人宽。凡是要求别人做

的事，他自己必定先做到，这已成了他的生活准则。他一辈子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论在部队工作，还是在宁夏、陕西任省委书记、省主席，和在驻外使馆当大使，都是如此。一直到“文革”前，家中没有锅灶，一贯到机关食堂吃饭。他在任省委书记、省主席期间，没有为一个亲属安排过工作。他姐姐有个儿子，是村里的会计，来到西安找他，想让他这个当大官的亲舅舅在省城给找个工作。他安排外甥住了两天，便劝他回村里好好工作。潘大使有一双旧皮鞋，是1952年部队发的，因为鞋大，他不能穿，他的大儿子潘亚黎拿去穿了，他知道后批评了儿子，说不该穿公家发的东西。为此他还向组织作了检查。潘自力进京开会，从不带“土特产”给领导和朋友送礼。在国外当大使时，回国也不带什么“洋货”送给上级和亲友。即使在1960年国内生活困难时，也没有带回一尺布、一盒糖、一条烟。亲友们都知道他的为人品格，都习惯了，也从不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在使馆工作，难免礼尚往来，但凡是送他的礼品，不管大小、多少，他一概不许往自己房里拿，让翻译全部送交办公室处理。他的为人是：对上不趋附，对下不拉拢，清清白白，端端正正，办事认真，无私无畏。按照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人。

五、光明磊落，忠心耿耿

在“文革”中，潘自力大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

酷迫害。1969 年，他带着 80 岁的老岳母和 10 岁的儿子被下放到湖北干校劳动。在那里他既要照料老人，又要照料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妻子那时早已被送到江西干校劳动。离开北京时，他不让带任何吃的东西，到干校后也不许到干校小卖部去买罐头等食品，或去村里买食品，只在食堂里吃饭。他说，既然是下来劳动锻炼，就不能生活特殊，大家能过，我们也能过。由于营养不良，加之劳累，他那高大的身躯日见消瘦，体重由 80 多公斤，减到了 50 多公斤。

1971 年 5 月，潘大使又被强制遣送到山西省霍县。那时他已体弱多病，而供应的几乎全是高粱面、玉米面，就是小米一个月也只是一两斤，其他任何照顾都没有。他的胃肠不好，实在没办法，妻子向他提出在农贸市场买点麦子，弄点面吃。但他不让买，说霍县这么多人能这样过日子，我们也能过得去。过雪山草地时，如果有高粱面吃，我们的好多同志就死不了。妻子说他身体情况不同了，那时年轻，现在老了，又有病，但怎么说服，他就是不许到市场上买小麦。尽管他体弱多病，生活条件又不好，但他总是闲不住，总是要找活干，他说没事干难受。当时妻子在县医院工作，他就经常和妻子一块去为医院采集草药。为了治好他的病，妻子要求回北京给他看病，但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妻子想给周恩来总理发个电报或写封信，他说总理的处境也不是那么好，不要给总理找麻烦了，我的病能好就好，我也愿意好，好了继续为党工作；万一好不

了，也不要紧，人总有一死嘛！他就是这样，硬是不让给总理写信和发电报。

霍县是一个只有 10 来万人口的山区小县。潘自力夫妇在霍县时被安置在一个破窑洞里。据说那里曾经是一座古庙，又阴暗又潮湿，他们进去住时，墙壁、地面都是湿的，一下雨就漏得到处是水。但总算有了个家，有一定的自由和相对安静的生活，不再挨批斗、不再写检查了，有了充裕的时间，他从太原买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说过去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现在可以安心读书了。他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开始读，一本一本地认认真真地读起来。他常对妻子说，要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 1972 年 5 月 22 日在山西含冤与世长辞了，终年 68 岁。

潘自力大使的追悼会于 1979 年 2 月 26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耿飚、聂荣臻、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杨勇、伍修权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外交部等部门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乌兰夫、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姬鹏飞、康克清、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主持，外交部部长黄华

致悼词。悼词中说，潘自力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英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转战华北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尽艰险，忠心耿耿，为全国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一个损失。

悼词中说，几十年来，潘自力同志不论在部队，在地方，在任何岗位上，都勤奋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正派，关心群众，注意培养干部，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他是一位大公无私，顾大局，识大体，深受群众尊敬的老干部、老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全国解放以后，潘自力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外交路线，认真地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工作是卓有成绩的。

悼词中说，潘自力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但立场坚定，顽强不屈，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恶行径坚决斗争，始终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表现了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对党忠诚的高贵品质……

注：本文曾参照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潘自力》——作者

深厚的中朝友好关系

乔晓光



乔晓光

(1918～)

1955 年 12 月调入外交部。

1956 年 4 月至 1961 年 7 月任
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1956 年 4 月我出任驻朝大使，至 1961 年 7 月奉调回国，任期共 5 年零 100 天。在那紧张工作的 1925 天的日日夜夜，对于我这个外交工作经验不足的人负荷是够重的。要说我的大使生涯，无非是小心翼翼，努力尽职而已。

在我任期内，中朝关系与其他国家一个不同之点，在于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有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留驻朝鲜。志愿军虽然是直接与朝方打交道，但有些事务也经过使馆办理，尤其是 1958 年决定撤军以后，事务性的来往就更多。因此，我想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发展中国友好关系方面的作用，